

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城乡精神文明新形态^[*]

刘志刚

(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江苏 南京 210009)

[摘要]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维持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动态平衡。物质贫困虽然从整体上决定精神贫困,精神富裕却并非物质富裕的必然结果。从城乡关系意义上说,精神贫困是人类现代性的消极后果,并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表现出“城市病”或“乡村病”等典型症候。而作为消除精神贫困、解决城乡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破题之举,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创新性发展的产物,也是促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价值旨归。它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物”支配“人”、人的发展从属于资本的资本至上逻辑,并因构建城乡交融互哺的精神生态、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劳动—资本”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创造了城乡精神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城乡精神文明新形态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4.09.007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类社会与动物界的最大区别就是人是有精神需求的”,^[1]“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2]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共同富裕,既不是脱离物质基础空谈上层建筑的共同富裕,也不是脱离精神支撑的单向度物质富裕。无论是物质文明滞后于精神文明,还是精神文明滞后于物质文明,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共同富裕,而且背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初衷。建立在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基础上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尺度,更为促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明确了实践指向。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3]并因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它在强调物质富裕的同时更观照人的精神利益,并以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形式加以呈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立足于“乡土中国→城乡中国”社会结构转

作者简介:刘志刚,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唯实》杂志副总编辑。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城乡文化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实路径研究”(23BKS100)的阶段性成果。

型的时代背景,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所创造的城乡精神文明新形态,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彼此观照、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互促共进。

二、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思辨及其创新性发展

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的中国化时代化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共同富裕,在创造性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共同富裕思想及其制度化构想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城乡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本质要求。而作为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富裕思想创新性发展的时代产物,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辩证关系,并为城乡共同富裕提供了精神支撑。

(一)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辩证关系

物质(存在)与精神(意识)是哲学范畴的基本问题,二者相互影响、彼此制约,维持着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动态平衡。人的社会生活本质上包括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两大基本向度。精神生活根源于物质实践,是物质生活和物质交往的产物;精神生活反作用于物质实践,并为物质实践提供了价值支撑。具体到贫困与富裕问题,虽然“物质贫困从整体上决定精神贫困”,^[4]但精神富裕并非物质富裕的必然结果;虽然共同富裕既包括物质富裕也指向精神富裕,但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之间既非齐头并进也非互为因果,而是一对辩证而不绝对统一的关系(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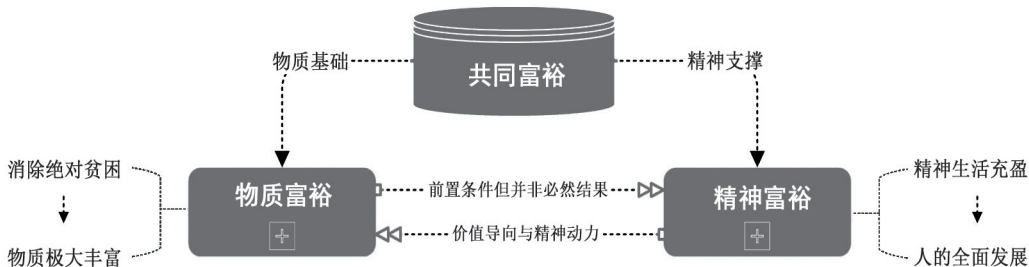


图1 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的逻辑关系

共同富裕是涉及城市与乡村、涵盖物质与精神的复合命题,^[5]体现了全局与局部、整体与个体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标,要从全局上来看。”^[6]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指向的城镇化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城镇化,既不是把乡村变成城市,也不是一味地“以乡养城”或“以城统乡”。“一边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城市,一边却是越来越萧条的乡村,那也不能算是实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7]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强调物质生活共同富裕,更指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所呈现的美好生活,既包括社会物质文明高度发达、城乡居民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更强调社会精神文明程度整体提升、城乡居民精神世界丰富充盈。作为“美好生活的基本向度”,^[8]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是脱离物质富裕而独立存在的抽象命题,更不是物质层面的单向度富裕,后者极易陷入精神世界荒芜的物化泥淖并“导致精神生活超越性特质的退场”。^[9]

物质生活共同富裕与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虽并非因果,但互为条件、互为目的。一方面,物质富裕是精神富裕的前置条件。司马迁从“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管子·牧民》)中,得出物质决定精神即“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史记·货殖列传》)的结论。美国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则

将满足“衣、食、住”等物质层面“生命攸关的需要”,视为“实现包括粗俗需要和高尚需要在内的一切需要的先决条件”。^[10]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断同样证明了上述观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社会意识形态为表现形式的上层建筑,首先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和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11]另一方面,物质富裕虽然对精神富裕具有决定性作用,但物质共同富裕并不能顺理成章地解决精神贫困问题。尤其是对于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而言,其精神文化更新和道德审美转型可谓任重道远。当然,物质富裕并不必然带来精神富裕的判断,无法掩盖物质富裕、精神富裕互为条件、互为目的的客观事实:没有物质生活共同富裕,精神文明融合就无法落地生根;没有精神文明融合,物质生活共同富裕同样难以为继。^[12]仅就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而言,精神富裕为物质富裕提供了价值导向和精神动力。

(二)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城乡融合的趋势性判断和关于共同富裕的科学论断,将人的精神富有视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为促进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支撑。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创造性继承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基础上,创新性发展了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实践指向。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将社会精神富裕与个体精神富裕有机结合起来的同时,使其成为改造主观世界、满足城乡居民精神文化需求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将城市和乡村视为“历史的统一体”,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总结出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的历史规律。不仅在此基础上将城乡关系的演变进程分为“城乡依存→城乡分离与对立→城乡融合”三个阶段,而且提出了“城乡融合”是城乡关系高级形态的科学论断。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3]并将“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14]视为资本主义城乡关系负面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并未明确提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概念,但认为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5]这充分体现了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同时,纠正并摆脱了以牺牲精神富裕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物质富裕必然导致精神富裕等错误认识,进而将满足城乡精神文化需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尤其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16]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这一科学论断,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7]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在遵循城乡关系客观规律、物质与精神辩证法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的结构性调整,并因致力于促进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而建构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新场域。

三、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面临的精神困境

城乡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精神贫困,某种意义上是人类现代性的负面衍生物。城乡主体的意义失落、道德滑坡、信仰缺失等精神病症以及由此引发的城乡精神异化危机,既是西方城市化的负面产物,

也是我国城镇化面临的现实问题。虽然中国式现代化以其成功实践历史性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为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但随着物质层面绝对贫困的消除,精神层面相对贫困的问题愈发凸显。与城镇化相伴而来的娱乐文化泛滥、消费主义盛行,侵蚀着城乡社会的精神生活样态,并造成了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贫乏与精神世界虚无。

(一)精神贫困成因及其外在表征

与物质贫困包括绝对贫困、相对贫困相类似,精神贫困也有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分,并具体体现在行为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层面,也有学者将其分为“物质相对贫困人群的绝对精神贫困和物质相对富裕人群的相对精神贫困”。^[18]绝对精神贫困是指,受社会物质生产条件落后、科学文化知识匮乏等因素影响,社会个体或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生活方式单调、思维方式僵化、价值观念滞后、精神生活贫乏等状态;^[19]相对精神贫困则是指精神生活落后于物质生产的状态,即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整体提升的前提下,社会个体或群体的精神境界因未同步跟进而落后于社会整体精神水平的生存状态。精神贫困既是物质贫困的直接产物,更是经济发展水平、文化教育程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内外部因素差异协同作用的结果。伴随快速城镇化而来的商业文化、娱乐文化遮蔽了城乡居民精神交往的内在价值,裹挟其中的消费主义文化、物欲至上价值观成为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掣肘,使精神文化产品的物质意义、精神内涵被其符号价值遮蔽,进而导致精神文化对社会有机体作用相对有限,普遍价值判断与主流价值观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无论是社会整体的绝对精神贫困,还是城乡之间的相对精神贫困,都是制约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对于城镇化过程的乡村与城市而言,其精神贫困有着不同的成因与外在表现形式。

乡村精神贫困现象的形成,既是自然经济时代物质困境长期作用的结果,也是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政策的滞后反应。一方面,物质贫困所形成的城乡经济落差,使乡村长期陷入思想封闭、精神空虚的困境。尽管传统农耕文明时代以农业为基础、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但乡村在城乡博弈中长期处于被压制地位。自然经济状态下形成的随遇而安的生活教条,经验主义图式造就的抱残守缺的心理习性,封建迷信思想、愚昧落后观念所形成的文化惯性,造成了乡村社会的精神贫困并代际延续。近代以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的西方殖民者,除通过文化殖民“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通过精神控制“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外,^[20]显然无意于解决近代中国的文化失调或精神贫困问题,更谈不上促进乡村精神世界的现代化更新。另一方面,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物理空间、文化空间的双重空心化加剧了乡村精神边缘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对城乡关系政策数次纠偏,并实现了从城乡二元分割到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性转变。尽管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性解决了乡村物质层面的绝对贫困问题,但城市偏向的城乡关系政策造成了事实上的乡村空心化与精神边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甚至可能让乡村“沦为现代化过程中的失意者和被遗弃者”。^[21]乡村因无法与城市平等互动、同向发展而成为附属于城市的边缘地带,并因缺乏足够的现代化滋养而难以形塑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相同步的精神世界。

城市精神贫困现象的成因同样复杂。一方面,“千城一面”的城镇化背离了既往的城市文化传统。城市现代文明与文化传统的彼此割裂,对舶来城市化观念的机械复制,二者相互作用造成城市社会的集体失忆。城市传统格局、街巷肌理等文化空间被不同程度地破坏,“千城一面”的文化景观在同化城市居民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的同时,消弭着城市的集体记忆乃至精神个性。另一方面,对西方城市化模式的简单模仿,异化着城市居民的文化心理和精神世界。城镇化所裹挟的工具理性、消费主义、娱乐至上等西方价值观,使城市居民过度追求物质享受和表层感官刺激,人的精神世界与现代文明走向

发生背离,并因此加剧了城市精神贫困。沉浸于消费主义感官娱乐中的人们,“史无前例地进入到一种停滞状态之中”,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将这种停滞状态称为“动物情形”。^[22]赵汀阳对此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和担忧,“如果娱乐成为最高价值,同时还反对宏大叙事和深刻思想,这样就形成一种轻浮和软弱无力的精神结构……用小叙事代替宏大叙事,用娱乐代替思想,这样腐败的精神最终会导致社会的崩溃。”^[23]

(二)城乡精神病态的作用机理及其负面影响

作为快速城镇化的负面衍生物,“城市病”与城镇化进程相伴相生;这种“城市病”蔓延至乡村,又催生了另一种城镇化症候,即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乡村衰退导致的‘乡村病’”。^[24]当然,“城市病”的“病因”并不能完全归结于城市。“城市病”与“乡村病”同病相怜、互为病因,进而形成“城乡病”(见图2)。一方面,乡村人口、土地等资源要素大量流入城市,在促进城市发展的同时造成了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公共服务设施超负荷运转等“城市病”。另一方面,这种“城市病”伴随城市扩张或“逆城市化”蔓延至乡村,又衍生出村落空心化、老人妇女儿童“三留守”、社会关系离散等“乡村病”。“城市病”与“乡村病”相互叠加,加剧了城乡居民的道德退化、道德滑坡等精神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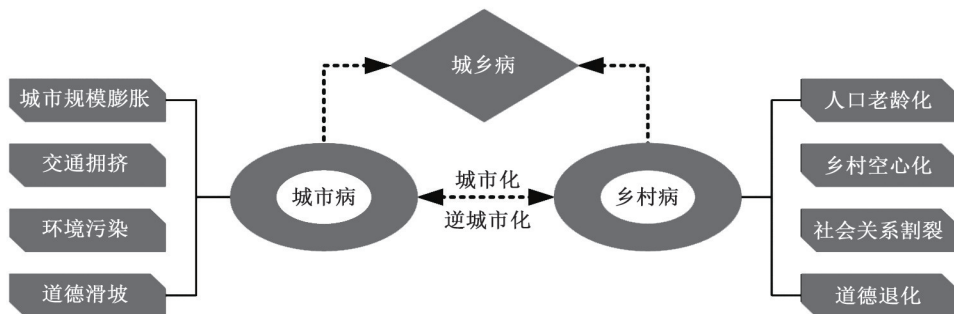


图2 “城市病”与“乡村病”的表现形式及其作用机理

虽然“城市病”并非城镇化的必然结果,但与城镇化这个特殊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伴随快速城镇化而来的“城市病”或“城乡病”,不仅表现在物理空间与物质文化层面,而且体现为更深层次的城乡价值观念博弈与精神秩序冲突。在物质文化层面,快速城镇化带来了城乡差距拉大、社会空间割裂、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等现实问题,在造成城乡对立的同时衍生出精神贫困问题。从西方城市化进程看,物质财富增长伴随着道德滑坡,商品拜物教掩盖了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内在需求。城市化催生出诸多“明显的社会弊病”:传统血缘关系、宗法从属关系、家庭关系纷纷解体,“从乡村转到城市、从农业转到工业”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25]而我国快速城镇化同样滋生出严重的“城市病”。在城市自身,主要表现为人口规模急剧膨胀、公共资源短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一旦这种“城市病”蔓延至乡村,被城镇化激活的物欲主义加剧了弱势农民的经济贫困感受,进而导致更深层次的城乡冲突和社会失衡。在精神秩序层面,城市与乡村表现出不同的精神病态。在城市发达的现代性中,“理智压倒情感、计算统摄一切”成为通行的商业法则,这种“城市生存原则”衍生出情绪焦虑、情感抑郁、急躁偏执甚至精神分裂等心理健康与精神卫生问题。而乡村在从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流动的现代性导致村民日常生活情境与精神生活情境脱嵌,精神生活的碎片化使个体或群体与乡村共同体发生背离,并表现出审慎甚至冷漠的人际交往态度,以及无意义感的个人存在等精神病态。此外,城乡主体精神生活越来越受到商业资本、技术异化的约束,社会信任系统的潜在风险增加了价值体认的不确定性。

四、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城乡精神文明新形态

如何处理好工农城乡关系,既是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成败。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性判断,提出了“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新的时代命题。这一命题丰富了城乡融合发展的整体内涵,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性逻辑;既是解决城乡精神文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矛盾的破题之举,也是推动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战略部署。它所强调的拓展城乡公共文化空间,旨在构建城乡互融共生的精神生态;它致力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明确了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导向;它使“资本正义”回归“劳动正义”与发展正义,并因此创造了城乡精神文明新形态。

(一)精神生态:城乡互融共生的公共文化空间

城乡精神世界的关联性互动与社会结构变迁密不可分,并对城乡关系演变具有“决定性作用”。但长期以来“城市先进、乡村落后”的惯性思维,造成了城乡公共文化空间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非均等化。公共文化非均等化及其建构的城乡精神生活等级,显然脱离了“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26]这一历史事实,并因忽视城乡主体基于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而夸大了城市在精神生活层面的进步性。城乡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精神生态,有悖于公共文化交往的空间正义;人的精神生活公共向度缺失与价值共识淡化,不利于城乡居民的自由全面发展。

修复与优化城乡精神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以城乡主体精神交往、文化交流促进城乡精神文化空间融合,塑造资源要素双向奔赴、精神文化融合发展的城乡共同体,是实现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一方面,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既有历史必然性也不乏现实基础。快速城镇化滋生的负面精神生态,影响着城乡居民的思维方式、审美偏好和价值追求;它所裹挟的工业理性、消费主义,使城乡居民的精神实践、价值体认发生了结构性转换,人们沉溺于消费文化、娱乐文化所带来的感官刺激而无法自拔,感性化、碎片化体验取代了对精神世界的内在反思。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城乡文化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城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更加均衡,为城乡居民精神交往建构了新的共同体场域。而塑造城乡互融共生、双向互哺的精神生态,将使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因摆脱物质欲望羁绊、精神空间异化而变得更加充盈。另一方面,跳出将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割裂开来的单向度思维,尊重并保障城乡居民追求更高境界精神文化生活的权利。城乡居民之间的文化交往与精神融合,有利于城乡两种精神文化空间形态的相互启迪、相互建构。既要通过健全城乡公共文化体系,提高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等城乡公共文化空间布局的均衡性,以及城乡精神文化公共服务的可及性;也要推动公共文化“生产—交往—消费”资源的全过程共建共享,不断拓展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物质空间和精神内涵,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其与生俱来的价值整合功能,为城乡文化交往乃至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奠定了价值基础。价值观是人存在的意义系统,是体现人的理想追求的信念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27]“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多种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要把全社会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必须有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28]一方面,城乡精神文明代表着社会文明发达程度,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着公共文化的精神高度,并集中反映城乡居民的共同理想信念和精神追求,二者之间是“体”与“魂”的关系。^[29]离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贯穿于城乡精神文明

建设融合发展全过程的灵魂,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偏离正确方向。要深入挖掘体现中华文明共性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将新时代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有效融入城乡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框架下重构城乡文化层面的内在链接和精神层面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城乡之间的文化互动与精神交往建立在价值共识的基础之上,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普遍认同的主流道德,为城乡居民提供了共同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30]既是衡量城乡居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标尺,也是形塑城乡居民家国情怀和心灵秩序的精神向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引领作用,将其精神实质融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过程,有利于矫正城乡精神文化产品同质化、庸俗化、泛娱乐化倾向,使精神生产回归价值理性,从而凝聚起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广泛价值共识。

(二)价值导向: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西方式现代化的文明痼疾,决定了其城乡关系的内生逻辑悖论——“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31]“资本逻辑”泛滥导致物的尺度与人的尺度相分离、精神生活物化,成为西方城乡关系乃至资本主义文明负面效应的显著标志:日益膨胀的物质欲望挤压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空间,被物欲支配的感官需求宰制着人们的理性思考,“人的需要的畸形发展、精神世界的扭曲和贫乏”^[32]成为西方城乡社会的典型精神病态。与西方式现代化必然带来精神生活贫瘠、人的全面异化不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城乡居民全面发展的现代化。它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3]的“自由人联合体”理论,实现了个体与社会、城市与乡村的辩证统一;它所涵盖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全面现代化,首先着眼于“人的现代化”;它遵循整体性文明逻辑,并因此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以“物”支配“人”、人的发展从属于资本的逻辑。

作为“共同富裕最高维度的现象级表达”,^[34]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将人的全面发展视为先决条件和必然要求,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本质要求,更是检验中国式现代化成效与成色的精神尺度。虽然从物质表层看,现代化是“物”的问题,但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等美好生活需要,最终落脚点都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提出了“社会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归宿,人的发展以精神文化为内核”的观点,并强调“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35]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人的精神生活不断充实、道德人格日臻完善、个性潜能充分发挥的过程”,^[36]并为促进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精神条件。

从某种意义上说,城市是由乡村集中生产生活而衍生出来的文明形态,城乡精神生产与价值生成体现了中华农耕文明的共性特征。城乡精神生产、价值生成的同源性特征,决定了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城乡之间相互启迪、协同共进的过程。作为城乡关系的高级阶段和理想状态,城乡融合发展离不开工业文明的效率优势和农耕文明的礼俗温情。一方面,要深入挖掘乡村农耕文明蕴含的道德规范和礼俗传统,并在借鉴城市文明工业理性、法治刚性的同时对其加以现代化更新;妥善解决老人、妇女、儿童等乡村“留守群体”的精神需求与城市化农民的“精神城市化”问题,有效缓解快速城镇化带来的集体身份焦虑与生存焦虑。另一方面,将农耕文明的礼俗传统融入现代城市的商业理性和契约精神,在体现城市文明工业效率的同时使其回归城乡关系的精神本原;通过提升城市居民道德认知水平和精神境界淡化精神文化消费的符号色彩,使社会个体挣脱物欲化、世俗化的“消费主义泥沼”,进而构

建兼具发展效率和正确价值导向的城乡共同精神家园。

(三) 正义转向：“资本正义”向“劳动正义”的回归

“经济体系、文化和性格结构的相互关系构成了资产阶级文明。”^[37]在西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下，资本依靠统治并剥削劳动而存在。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把资本对劳动的统治视为普遍的、超历史的“天然正义”，这种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所谓“天然正义”，致使劳动依附资本、乡村附属于城市而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催生的劳动异化造成人们精神世界的全面物化。“资本正义”所裹挟的西方城乡关系，不断暴露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38]的人本主义弊端。马克思恩格斯清醒地认识到“资本正义”的内生悖论及其实质：“资本正义”仅仅停留在流通或交换环节，一旦深入到生产和分配领域，这种所谓“正义”就成为资产阶级的特权，其所谓“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39]资产阶级借助其物质财富支配权，对精神生产资料形成了绝对垄断。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揭示“剩余价值规律”来建构劳动正义，在对基于资本与劳动不等价交换关系的所谓“天然正义说”予以坚决批判的基础上，将劳动正义视为使精神生活具备获得感、意义感的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关于城乡融合的趋势性判断，在超越“资本统治劳动、乡村依附于城市”逻辑的同时体现了城乡发展正义，进而实现了从“资本正义”到“劳动正义”的城乡关系转向。

西方式现代化及其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以其资本逻辑驾驭并支配城乡居民的精神生活，以其物化逻辑将人囚禁于物质的“牢笼”中并使人越来越表现出“动物性”的一面。“作为一种解释性图式，西方现代化理论有其历史背景、政治功能、意识形态诉求和文化意义，第三世界的现代化实践是被排斥在现代化叙事之外的。”^[40]西方式现代化及其建构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刺激了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主义膨胀，在“改造”发展中国家“文化—心理”结构的同时，使人们的自尊心成为物质财富的附属品。而中国式现代化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了西方“人本主义”话语的实践悖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城乡融合发展，创新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是对社会劳动正义、城乡发展正义的准确表达。如果说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为根本任务、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富裕为价值追求的中国式现代化，在有效克服西方式现代化“资本正义”痼疾的同时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那么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在精神文化层面的具象化表达，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在激活“资本的文明面”基础上有效遏制了资本向精神文化领域无序扩张，它“既利用资本又规制资本，使资本利益绝对服从于人民利益”，^[41]并因致力于促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实现“劳动—资本”关系辩证统一而创造了城乡精神文明新形态。

五、结 语

“精神境界的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最本质的反映。”^[42]西方式现代化所创造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显然背离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类文明进步方向。英国学者保罗·哈里森将其形容为“一种更为阴险的控制形式”——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文化上的帝国主义不仅征服了受害者的肉体，还征服了他们的心灵，使他们沦为唯命是从的帮凶……西方化的现象已经扩展到第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由于没有西方化的人受到歧视，这一现象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它钻进当地社会的主动脉，从内部散布毒素”。^[43]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全球扩张与病毒式蔓延，剥夺着发展中国家塑造精神世界的主动性和话语权；内隐其中的资本至上的物化逻辑，客观上造成了物质层面的“城市崛起、乡村凋敝”，以及精神层面的城乡道德水平整体滑坡。

中国式现代化是“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的辩证统一过程。它不仅有效克服了西方式现代化全面物化逻辑及其导致的“精神贫血症”,而且因满足城乡精神文化需求、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劳动—资本”关系的辩证统一而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44]城乡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规定和精神图景,既是对物质生活、社会进步具有正向影响的社会心理和精神文化状态,也是新时代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15页。
- [2][35]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0页。
- [3][17]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23,44,22页。
- [4][19]余德华:《论精神贫困》,《哲学研究》2002年第12期。
- [5]项久雨、马亚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内涵、层次结构与实现进路》,《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6期。
- [6][16]《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506,36页。
- [7][24][26]习近平:《论“三农”工作》,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237,240,64页。
- [8]柏路:《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时代意涵与价值遵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 [9]李梦云、余其安:《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向》,《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4年第1期。
- [10][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6页。
- [11]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页。
- [12]胡守勇:《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的理论内涵与分析框架》,《中州学刊》2023年第8期。
- [13][20][31][3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5,405,51,422页。
-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44页。
- [15]恩格斯:《反杜林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05-306页。
- [18]王爱桂:《从精神贫困走向精神富裕》,《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 [21]樊慧慧:《塑形与铸魂: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乡村精神审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3年第4期。
- [22][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敬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193页。
- [23]赵汀阳:《哲学原旨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 [25][3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5,364页。
- [27]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2页。
- [28]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第98页。
- [29]滕翠华:《中国特色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98-199页。
- [30]《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3页。
- [32]郝立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 [34]徐达:《技术变革抑或创新尝试:数字文化赋能城乡融合实现文化共富的探索研究》,《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4期。
- [36]吴艳东、廖小丹:《精神利益与精神富裕: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特征》,《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 [37][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页。
- [3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 [40]王尧:《乡土中国的现代化叙事——从乡土文学到“新乡土文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9期。
- [41]刘志刚:《中西方现代化的不同逻辑起点、模式选择与价值追求》,《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1期。
- [42]叶南容、唐仲勋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新人》,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第25页。
- [43][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希望》,钟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6,43页。
- [44]项久雨:《人类精神文明新形态论要》,《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2年第19期。

[责任编辑:刘姝媛]